

厉华 主编

红岩魂

纪实系列
来自B类档案的报告

孙曙 陈建新 编著
刘和平 王庆华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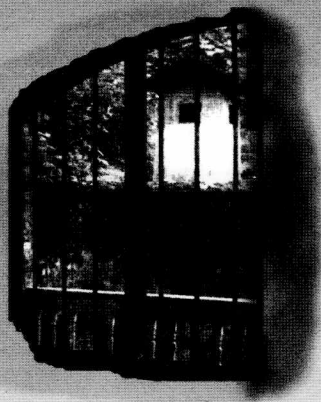


医药学院 610 2 07004151

红岩魂

纪实系列
来自 B 类档案的报告

孙 曙 陈建新 编著
刘和平 王庆华



重庆出版社





医药学院 610 2 07004151

1(CIP)数据

来自 B 类档案的报告/孙曙等编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10

(红岩魂纪实系列/厉华主编)

ISBN7-5366-4767-0

I. 来… II. 孙…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999 号

红岩魂纪实系列 来自 B 类档案的报告

厉 华 主编

孙 曙 陈建新 刘和平 王庆华 编著

责任编辑 廖建明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20 千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 251 - 15, 500

ISBN7-5366-4767-0/D·197

定价: 14.50 元

《红岩魂纪实系列》编委会名单

主 编：厉 华

副主编：傅俊弼 袁汝光 黄家玲

编 委：陈建新 刘和平 王庆华

目 录

第一章 黑暗之魔	(1)
小瘪三又来了	(1)
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6)
军统——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力量之一	(13)
最后的“辉煌”	(20)
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31)
附:真假保密局	(33)
第二章 保密局在行动	(34)
毛人凤四飞重庆	(35)
孤注一掷	(39)
竹篮打水	(53)
第三章 末日的疯狂	(55)
“一一·二七”大屠杀	(55)
大爆破	(69)
“大游击”	(74)
第四章 拨云见日	(78)
蒋介石两飞重庆	(78)
解放军挺进大西南,重庆解放	(85)
接管重庆	(95)

第五章 忠魂祭	(116)
杨虎城将军的最后岁月	(116)
花坛下的秘密	(125)
罗世文、车耀先忠骸寻觅记	(135)
第六章 叛徒的罪恶和下场	(140)
堡垒从内部攻破	(140)
叛徒的哲学	(153)
血泪的嘱托	(154)
第七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61)
徐远举昆明被擒	(161)
“笑面虎”周养浩昆明机场现形	(166)
“麻子司令”杨元森缴械	(169)
“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被擒	(173)
“行动老手”钟铸人伏诛	(180)
军统“金刚”刘志钦受审	(185)
“猫头鹰”徐贵林	(188)
白公馆代所长张少云	(192)
白公馆看守宋惠宽	(197)
破坏“民革”的“红旗特务”李君英、蔡介夫	(200)
破坏《挺进报》的罪魁李克昌	(209)
一个奇怪的“贫农”——杨进兴	(218)
中校杀手——漆玉麟	(227)
“马车夫”程遂愿	(233)
千里追踪擒“狡兔”——张界	(235)
左志良上吊自绝	(239)
第八章 善恶终有报	(243)
带出 300 名政治犯名单的医官刘石仁	(243)
冒杀头之罪沟通狱内外联系的看守黄茂才	(247)

立地成佛的看守杨钦典	(251)
火上浇油被枪决的赵正清	(254)
第九章 改造、新生	(257)
曲路择善、戴罪立功的李修凯	(257)
被关进自己所建监狱的徐远举	(263)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269)

第一章 黑暗之魔

小瘪三又来了

1926年9月,时年29岁的浙江省江山县人氏戴春风,为了寻求前程和出路,考入了黄埔军校,并改名戴笠,字雨农。

当时,由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至戴笠入校时已在黄埔军校的师生中愈演愈烈,有时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直到1927年4月15日,双方终于摊牌了。

这天早晨,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开始整理内务、洗脸,然后集合到大操场做徒手体操。但到大操场集合后,学生们看到校内外和操场周围站满了武装哨兵。戴笠站在队列中,和其他学生们一样,既感到十分奇怪,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不准交头接耳和自由谈话,学生就用眼睛互相交流着内心的疑虑。各区队值日生照例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

“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原地不动。”
戴笠所在区队的队长这样连续喊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最后,第十七连的连长说:

“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的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

接着,有几个共产党员学生陆续站在队列前面,随即被逮捕,由武装哨兵押走。被捕学生大都很从容,没有难过和恐惧,倒是队列里的那些同学却格外紧张,有些低下了头,有些脸都变了色。之后,第一团团集合讲话,说黄埔军校后方留守处奉蒋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并说“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和遵守纪律”。

当日军校内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师生达数百人,分别被解往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关押,有的则夜间被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因为清党,原由共产党人担任的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一职空缺,蒋介石派令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补缺。胡靖安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一到任就在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动员师生互相检举揭发,稍有嫌疑,立即逮捕,搞得入伍生部的师生人人自危。戴笠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从“四一五”事变中,他已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更感这是天赐良机,立即通过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向胡靖安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并附上每个学生的活动资料,以做证据。胡靖安得到名单如获至宝,立即照单捕人。戴笠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被引为亲信。据此,戴笠认识到情报和密报的重要性,对搜集情报和进行密报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久,因胡靖安的清党活动严重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校上下反应强烈,蒋介石也不想将其视为政治本钱的黄埔军校搞乱,就把胡靖安调到身边任侍从副官,主管情报工作。

1927年夏,戴笠掌管伙食经费时贪污菜金,后被发现。戴笠为避免受到惩处,顾不得还没有取得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的资格,便逃到南京投奔胡靖安,谎称:因在清党中告发学生,结怨在身,现

在有人借机报复,进行陷害,军校不能立足。胡靖安负责的情报工作正缺人手,经禀报蒋介石同意,将戴笠收留在身边。戴笠在胡靖安手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地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胡靖安递送。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的收留,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抱孩子,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这时的胡靖安绝想不到戴笠会有朝一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1927年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4月12日反共清共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这使蒋愈加被动。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新桂系加紧联合各方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发难。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蒋介石决定加强情报工作,以随时掌握新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部队的忠诚情况。1927年7月底,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向蒋推荐,戴笠等人为该组成员。这是蒋介石成立的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密查组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提高,戴笠很快显示出这方面的特殊才能。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直接交到蒋介石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蒋介石必到的地方,当蒋的汽车减速到达时,戴笠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笠的情报大都是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队控制住了南京周围

地区,与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串通一气,相约“逼宫”。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8月13日在上海发布下野宣言,同日赴宁波转奉化溪口原籍。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气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杀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时,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于1928年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蒋介石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先机。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任科主任是陈立夫。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在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戴笠就是其中的一个。为奖赏戴笠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而且颇有成效,蒋介石破格提升戴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

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即提出“二次北伐”的口号。2月,戴笠

受蒋介石秘密召见,先期出发华北、华中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系张氏集团的部署情况,供蒋介石决策参考。当“二次北伐”开始以后,戴笠再次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行前,蒋介石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笠如获至宝,自此,他时常自诩得校长真传。戴笠跑遍华北各省,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当时,戴笠最大的苦恼,是由于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戴笠以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见到蒋介石,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往往进不去。蒋介石身边有数十名侍从参谋或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打流人员,颇有些不屑一顾的神态。不但是黄埔老大哥轻视戴笠,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佣仆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开通往蒋介石身边的大门,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一见面就点头哈腰,极力奉承,送上一点小礼品,有时也被大敲竹杠,以致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吃晚饭的钱也没有。但这样一来,戴笠但凡有了情报,就可以从官邸后门送到厨房,交到厨师或勤务兵手中,由他们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戴笠在这一段时期主要是跑单干,如在南京做特务工作时,每天一清早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然后又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打过流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由戴笠校阅定稿。然后,戴笠草草睡一会,天不亮就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这时戴笠如有钱,就花上一两块大洋租一辆车去官邸,如没有钱,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对戴笠的情报,蒋介石如果看得有意思,需要继续补充或跟踪调

查,就批给戴笠一些活动经费。戴拿了这些钱,照例抽头给蒋身边的人一点好处,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这样,他的情报更多,内容更充实,蒋看了也满意,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便开始布置眼线,雇请助手,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代任务,在蒋心目中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开始受到倚重。

戴笠后来经常借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对特务进行训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其所不能也要动心忍性使得他能。我们担任特种任务的人,要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忍像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俗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此后,戴笠在蒋介石与各派军阀的混战中,积极活跃,屡建功绩,极大地加强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私人代表处理东北军的事务。1930年,戴笠因功被蒋介石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1931年冬,蒋介石正处于东征北伐以来最困难的境地,同时面对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分庭抗礼、对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和“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而此时历来被蒋介石视为依托的黄埔系,内部却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蒋介石的命令往往不能贯彻始终。在内忧外困、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蒋深感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唤起新生,特别是要能够彻底搞垮政敌,维护和巩

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1931年11月初,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官邸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等黄埔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开会,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戴笠作为唯一的黄埔六期后进,亦被蒋指定参加会议。经过几次开会研究,贺衷寒、康泽等人建议以黄埔学生为主体,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或希特勒的“褐衫党”一样的法西斯组织,名之为“复兴社”。戴笠经过反复揣摩,进一步提出建立法西斯的“复兴社”组织必须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戴笠写了一份建议书,单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后,感到很满意,并考虑要在未来的“复兴社”组织之下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工系统。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胡汉民、汪精卫的联合进攻下,通电下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进行幕后策划,为第三次上台作准备。为了随时掌握胡、汪各派在南京的活动情况,戴笠奉命召集一批黄埔学生,计有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加上戴笠共10人,组成联络组,每日活动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密切注视国民党各派的动向,随时密报于蒋。这就是后来在军统中广为传闻的“十人团”。

1932年1月22日,蒋介石复出,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组织。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蒋介石指令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

1月28日,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蒋介石指令戴笠迅速组织一批黄埔学生,到上海前线搜集和分析军事情报。戴笠临危受命,立即召集原联络组的黄埔学生,组成临时性质的军事情报组,奔赴沪战前线,了解战场情况,“十人团”由此扬名。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戴笠为了能及时掌握十九路军及上

海各界人民抗战和战场每日的进展情况,工作十分勤奋。有时能连续三天三夜工作,饿了就啃烧饼油条,渴了就喝白开水,每天只吃两顿,保证了上海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能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的手里。

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次大弹“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戴笠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再次上书,陈述了为防范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分子,必须经常进行监视侦查活动;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太多,也要进行调查掌握,所以必须加强特工力量和活动。此建议受到蒋的重视,认为戴笠很有政治头脑,具有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必备的敏锐素质。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因为社员穿着蓝衣,故又名“蓝衣社”,蒋介石自任社长。3月下旬,蒋介石力排众议,破格任命戴笠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还安排资历高于戴笠的黄埔二期学生郑介民任特务处的副处长。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对黄埔生使用的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引起许多黄埔学生的非议。

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戴笠则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戴笠向蒋介石解释道:

“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1932年4月1日,戴笠正式受命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务处本部(简称乙处),另在联络组原址南京鸡鹅巷53号设立戴笠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简称甲室),并相继建立了内外勤组织,这是早期军统特务组织的雏形。以后的军统局就把每年的4月1日定为“四一纪念”。

戴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组织。在内部机构设置

和建设方面,戴笠主要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各级机关主持内部工作的一般是秘书长和主任秘书,而戴笠则在特务处内设书记,主持内部工作。戴笠成立的第一个外勤组织是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部设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设三个情报组,以后,特务处外勤组织的建制大致如此。戴笠设立的另一个较早的外勤组织是特务处天津站。为了监视和调查东北军的活动,掌握日军对华北的意图,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把平津地区的特工活动作为特务处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是特务处外勤组织最早设立行动组的一级机构,同时配备的一部秘密电台也是特务处外勤机构中最早的。

1932年6月,戴笠在毗卢寺、洪公祠举办了一个“特警训练班”,前后两期,是从“复兴社”举办的军校“特别研究班”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戴笠亲自与这些学员逐个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学员集体办理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成为职业特务。其中如何龙庆、陈恭澍、陈善周、廖宗泽、田动云、徐远举等人,后来均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大特务。特训班的意义在于,它使戴笠开辟了一条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为培养扩大自己特工队伍的道路。戴笠另外吸收特务人员的渠道主要是,由特务之间相互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参加。参加特务处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戴笠在特务处内部控制极严,设立了督察制度,秘密挑选政治可靠的特务担任,对单位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工作。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采取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

在1932年内,特务处已发展到100多人,初具规模。1933年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内勤机构方面,股升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特务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戴笠凭借蒋介石任命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巧取豪夺,掌握了浙警校的实际控制权,利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批准有案的巨额经费培训了大批特工人才,而且还借机培养亲信打入警界,扩大实力,使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浙警系”派别。1934年,戴笠吸收其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学毛人凤加入特务处,由此改写了军统组织后期的历史。

戴笠一生中并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论和经验,主要来自于他的实践以及有关苏联“格伯乌”、“契卡”组织的几本小书。他积多年亲身搞特工的经验,认为唯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为严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创建特务处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从而与中共进行斗争、打击反蒋势力等等。随着特务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参照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对特务处的活动作了不少的改进调整,其中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的方针下,控制掌握了大量公开机关,为蒋介石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如最早掌握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是京沪杭铁路警察总署。1934年,蒋介石因南昌机场大火案失职因由,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职,将邓手下的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